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另一種人才的培育：晚清商業教育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32

執行期間：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林能士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另一種人才的培育：晚清商業教育之研究

- 一、前言
- 二、晚清商業學堂設置的背景
- 三、商業學堂的設置情形
- 四、師資、課程及教學成果
- 五、結論

一、前言

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可代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動向，近年來台灣地區經濟高度發展，商業成爲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投射至教育層面則是商業教育的普及，重商儼然成爲社會主流思潮。然回溯中國歷史，「學而優則仕」爲社會主流價值，「商本末」的觀念也深刻於中國人的思想中，所以「抑商」也直爲統治者所採的政策，反應在教育上，則出現教育爲科舉服務，技藝教育不爲統治者及社會大眾重視的情況。

然晚清中國在政治、社會、思想文化上都產生了極大變化，爲因應這一全新的局勢，做爲培育人才的教育制度也在此時有了劇烈的變革。

在受教育的對象上，為能廣開民智，故有普及教育概念的提出，全國各地陸續開辦中小學堂，期能使全國幼童、少年均能入校求學；在教育內涵上，則是打破傳統教育以科舉為目標，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教育模式，轉為培養各項專才、教授各項新知，許多新式專門學堂紛紛設立，以應時代之需，達到自強救國、富國裕民的目的。商業教育即是在此種大環境下產生的新式教育。隨著西方經濟力量進入中國，傳統商業模式也遭受挑戰，商人積極尋求管道，吸收新知，各界要求政府籌辦商業學堂呼聲不斷，期能培養人才，以應新局。

然綜觀史學界對近代教育發展的討論頗多，唯對商業教育的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探其原因在於資料過於稀少分散，不易對此課題有完整的探討。¹資料的充足與否顯然是此議題能否得到討論的一大關心，觀察近相關資料的出版、整理情形可以發現，近年來中國大陸著手編輯許多教育史資料集，除了早期舒新城所編的《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²外，1983年由朱有瓚著手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³。此書共分為四輯七冊，分別為清末學制建立前的學堂（上、下二冊）；清末學制（上、下二冊）；民國初年學制（上、下二冊）；我國近代教會學校等。全書採主題式編輯方法，將各類史料分門列出，除了一般的官方奏摺外，也少量選錄了相關的專著或論文。另外，許多新式學堂考題、校歌等也在其選編的範圍，可稱為此套史料集的特色。

另一重要史料極為陳元暉主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此套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從1993年陸續出版，現已有鴉片時期教育、洋務時期教育、戊戌時期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留學教育學制史料、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師範教育等分冊刊行。前三者是以「時間為

¹ 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77。

² 舒新城原編有《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共四冊，於民國16年成書，民國17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收錄清末到民國16年間的教育史料。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則是1961年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出版，共三冊。此套史料集收錄1840年到1919年教育史相關資料，收錄史料的時間斷限較前書要短，但資料較為完整，並增錄太平天國的相關教育史料，此為其不同者。

³ 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

綱、專題爲目」，以時間來看教育發展；後五者則是以「專題爲綱、時間爲目」，旨在探討各種教育類別的特性。此套書不僅編輯官方奏摺，也編輯私人文集以及教育實施情形的相關資料，以補之前史料集的不足。此史料集爲目前教育史資料中編輯最爲完整者。除大規模的史料匯編外，陳學恂所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⁴共分上、中、下三冊，除收錄重要奏摺及文集外，在部份章節附有「史料簡介」，將所收集的資料來源做更進一步的說明，並附有相關主題的著作目錄，此爲其特色。陳學恂另編有一冊《中國近代教育文選》⁵，主要收錄清末知識份子對於教育所提出的看法。此書爲一較簡單的史料集，但是以人物爲綱目的方式，可以突顯出知識份子對時局的看法，這也成爲這史料集的特色。

大陸地區教育史料輯的編纂是其從事近代教育史研究的一大貢獻。這些史料集的收錄都較以前爲完整，觸角也更廣泛。雖然各種史料集有重覆之處，但在不同的主題的編排下，相同的史料也會呈現不同的意義。故這些史料集的編纂有助於近代中國教育史的再研究，爲其價值所在。

在套書的出版方面則可以看出此時期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中國大陸所出版的重要套書有由宋恩榮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系列研究》，此套書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現已有胡適、蔡元培、舒新城、晏陽初、嚴復、俞子夷、張之洞、張謇、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研究出版。針對近現代中國重要的教育人物進行研究，全書除了能對於教育人物的思想進行了解外，每一位教育家所經歷的也正是近代教育歷程的一部份，從中可以更進一步地探得近代教育發展的情形。

另外由田正平主編的《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叢書》也是大陸近年來研究成果之一，此套書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從1996年陸續出版，現有《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教會學校與

⁴ 陳學恂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⁵ 陳學恂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1版，1994年2月5刷）。

中國教育近代化》、《從湖北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等書出版，此套書主要是以近代化的觀點來進行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主要要瞭解近代中國教育在思想、制度、理論等各層面如何從傳統中突破發展，更以湖北及浙江兩省的區域研究來探討近代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情形，將教育近代化研究更顯完整。

除此之外，近年來大陸地區更有許多地方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出現，如齊紅深主編的《東北地方教育史》⁶、李喜平主編的《遼寧教育史》⁷、《安徽省教育大事記(1896-1995)》⁸以及諸多的地方教育志。這些研究廣泛蒐集資料且從地方志中細膩爬梳，將以往只能在思想、制度上著墨的教育史研究得以往更實際、更寬廣的層面加以討論，如學堂的實際授課情形、學堂與地方之關係、各地學堂特色等等，使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得以深化。

除了專書的出版之外，尚有陳學恂所編輯的《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⁹可作為教育史研究的工具書。此書的起訖時間為1840-1919年，收集的資料豐富，較先前丁致聘所編的《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¹⁰更為完備，可以補其的不足。

以上為大陸地區近年來有關近代中國教育史研究的概況，在史料集及相關套書的出版下，大陸地區的研究可謂頗有進展。

史學界對晚清新政及近代中國商人及商業研究的重視，也是讓近代商業教育相關議題得以討論的重要因素。在商人方面，八〇年代以後，大陸地區因實際政經的變化，對近代商人研究日趨熱絡，在商人群體、商人與政治、商人與經濟及社會變遷、商人思想與商人文化等層面均得到討論。¹¹晚清的經濟發展也有諸多的研究成果，如朱英的《晚清經濟

⁶ 齊紅深主編，《東北地方教育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

⁷ 李喜平主編，《遼寧教育史》(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

⁸ 王世杰主編，《安徽省教育大事記(1896-199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⁹ 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¹⁰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0年台一版)。

¹¹ 參加馮筱才，《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6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8月)，頁87-98。

政策與改革措施》¹²、《近代中國經濟政策演變史稿》¹³；李允俊主編的《晚清經濟史事編年》等，也使得此時期的經濟情形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加上許多史料集也紛紛出版問世，如彭澤益主編的《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¹⁴、《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¹⁵；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編的《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¹⁶等等，使得晚清經濟、商人等問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在教育史與經濟史的豐碩研究成果之下，以此為基礎，應可改善以往資料不足的問題，得以對近代商業教育發展做一初步的探討。本文即以《學部官報》、《商務官報》、《東方雜誌》、《教育統計圖表》及諸史料匯編中的相關資料為基礎，並輔以各項研究成果，從中探析在晚清思想、經濟的急遽轉變過程中，傳統輕商的價值觀逐漸改變，商業轉而獲得各界重視的情形，進而瞭解知識份子與清廷推展商業教育，創設商業學堂的情況。而此一新的人才養成辦法，如何推廣進行？有何特色？其教學成效與困難為何？均是本文欲加以討論的議題，希望從各項資料細膩爬梳中，建構起晚清商業教育的基本圖象。

二、晚清商業學堂設置的背景

(一)中國傳統之商人教育

傳統中國對商業發展不甚重視，抑商輕商更為文化思想中一環，即使明清時期，商業發展日趨活絡，四民觀念開始轉換，商人地位逐漸提

¹² 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¹³ 朱英、石柏林著，〈近代中國經濟政策演變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¹⁴ 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5年）。

¹⁵ 彭澤益主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¹⁶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升，而有所謂「新四民」的出現，士商階層愈難畫分。¹⁷但此種商人地位上升的情勢卻只是商人自身努力以及社會安定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發展結果，在文化思想上並未因此而將商業的價值提升，統治者也未著力於商業的推展，商業在中國尙未能得到一個普遍性的重視與發展。¹⁸

在輕商的風氣下，關於商人、商業的各項紀錄無多，完整的一套商學體系也自難出現。不過，歷代長久的經商經驗也使商界養成其自身的傳統，並發展出一套培育人才的方式。¹⁹追溯中國商業教育的嚆始，一般均將其推及行會中的學徒制度。²⁰中國行會的出現可以推及唐代，時官府為方便管理坊市的行，便要求同行業者分別聚居在同一市區之內，各行並設有「行頭」或「行首」。²¹到了南宋，城市分區破壞，以同業相聚的情形愈多，各項行規也逐漸成形。而在各行會規章中，即有培育該行人才的學徒制度，以培養後進。²²全漢昇在《中國行會制度史》中提到此種制度：

行會為獨佔利益，免除競爭計，遂設立行會制度，利用完全保存技術的手段來防止同業者的增加。徒弟大概是窮家子弟，年齡在七歲和十七歲之間，他們要想學一種職業以資糊口，所以他們的家長，託了保人將他們薦到某種職業裏去，保人須出具保單，單上大概須有鋪保和保人具名。某業公所收到保單後，即發給志願書，以便該行的店鋪可以收用，徒弟的學習期間，按各行的習慣而定。²³

¹⁷ 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5年），頁104-107。

¹⁸ 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1年7月），頁211。

¹⁹ 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5年6月）。

²⁰ 袁福洪，《商業教育之理論與實施》（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6年），頁22。

²¹ 彭澤益，〈中國工商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

²² 同前註，頁25。

²³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24年上海初版，民國67年台灣再版），頁131。

學徒制是一種技術的傳承，同時也具有相當濃厚保護色彩。許多行會嚴格限制學徒的人數，以維持其專業技術品質並減少競爭²⁴有些行會則規定，除了行會成員的兒子和侄子之外，不允許任何人學藝，²⁵使得各項專業知識成為家族的私產。

此種學徒制度是中國傳統的職業教育，商界人才養成也是採用此種模式。以山西商人為例，欲進此行的學徒「必須年齡十五至二十歲間，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儀態大方，家世清白，懂禮貌，善珠算，精楷書，不怕遠行，能吃苦」²⁶，而其培育的內容則包括兩方面：

一是業務技術，包括珠算、習字、抄錄信稿、記賬、寫信等，學習蒙、滿、俄語，了解商品性能，熟記銀兩成色。二是職業道德訓練，主要有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欲、敦品性、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辛辛苦、戒奢華，並派往繁華商埠，以觀其色。²⁷

專業知識與修養並重可說是傳統商業教育一大特色，而山西商人因與北方之俄、滿、蒙接近，為與其通商，更需語言上的訓練，使其商務得以順利進行。至於其它商幫是否教授其它知識或語言以應實際所需，則是不得而知了。

除了學徒制外，商業書也是商業知識的重要來源。隨著明清商業的發展以及印刷術的進步，坊間商書也越來越多，如萬寶全書中的〈商旅門〉中的〈客商規略總論〉即在介紹商品知識、經營方法以及商業道德修養；〈一統路程圖記〉、〈水陸路程〉、〈天下路程〉等則是提供行商所需的水路地理知識；講述商業道德的〈客商一覽醒迷〉；防騙的〈江

²⁴ 邱澎生在討論學徒的年限問題時，認為學徒的年限可以保障學徒的學習權利，但同時也可以延緩學徒成為伙友同行，減少競爭。在學額方面，其限制主要在防止老闆濫用學徒為廉價勞工，同時也可以讓同行生產有一定的技術水準。故許多行會對此均有所規定，以維護該行的發展。見氏著，〈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團體〉（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民國79年），頁166-168。

²⁵ H. B. Morse, *The Guilds of China*. 見孔涇源、蕭國亮所翻之《中國行會考》，收錄於彭澤益主編，〈中國行會考〉，收錄於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頁75。

²⁶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53。

²⁷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頁153。

湖奇聞杜騙新書》等等，這類書籍也成為商人習得各項商業知識的重要來源。²⁸

然自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經濟勢力逐漸進入中國，中西貿易日漸繁絡，而在此種經濟環境之下，傳統經商模式也產生了改變。許多舊式商人在大環境改變，而自身又未能跟上時代潮流的情形下，逐漸走向沒落。²⁹在各租界口岸出現則是出現了一批新式商人：買辦(comprador)。買辦階層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洋人來華貿易，對中國的語言、生活文化不甚了解，故聘請華人到其洋行工作，以協助其在華經商，故買辦也有華經理之稱。洋人選擇買辦有幾個基本考量，包含其語言能力、開拓業務能力以及可信度，³⁰晚清許多買辦的出身正是這些特質的體現。

表一：晚清買辦出身情形統計表

	新式教育	學徒、經商	買辦家族出身	傳統教育	其它
人數	14	29	7	2	2
比例	26%	54%	14%	3%	3%

資料來源：此表主要是根據徐矛主編，《中國十買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所附之〈六十買辦小傳〉加以整理統計而來。

如以上表資料來看，晚清於各地擔任買辦者，有曾於西式學堂受過教育者，因語言、觀念、環境等因素而成為買辦者；或是由學徒出身，於商場浸淫，習得一些洋涇濱外語及做生意的法門，進而入洋行擔任買辦；另一種情形，則是因家族中有人從事買辦工作後，擔任保人，將其帶入這一行。這些特質正和洋商對買辦的要求相合，他們絕多出身於傳統學徒或商號，對中國傳統經營模式有一定的了解，並利用傳統保人的方式進入此行，同時又從洋商或是西方教會學校、傳教士等處習得語言及西人貿易模式，以因應這新的商業情勢。

嚴格來說，買辦的角色是中西商人間的橋樑，而非真正從商者。但

²⁸ 陳學文著，《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3月），頁10-14。

²⁹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頁265-266。

³⁰ 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棣、杜恂誠等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年），頁188-189。

因其長期在商界活動，習得西人的經商理念，同時也培養出經商人脈，如參閱本文文末所附的買辦出身經歷表，則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買辦均曾投資於各項新式企業，從買辦轉為近代中國第一批的新式商人。這批買辦兼容新舊商人的特質，將這職業視為一種家庭事業，其子弟應承襲之，故多將其送到通商口岸或是外國的洋學校，「以期將來在『洋務』中圖個前程」³¹。這和傳統商人多盼子弟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態度有所不同，很多人已將商業視為本途，極欲家中子弟能在此行業中有良好的發展，故希望其能接受相關教育，以為本業所需。在商業學堂尚未開辦之前，洋行或是洋人在華所設立的學堂成為習得商業知識或是和西人貿易能力的重要管道，隨著各界興設商業學堂之聲漸起，中國自身的商業教育也才逐步慢慢發展實現。

(二)晚清商戰思想與商學之提倡

在西方國家挾帶強大經濟力量進入中國，帶給中國前所未有的衝擊，許多和洋人有所接觸的有識之士或善於觀察時局的知識份子均意識到商業發展的重要性。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指出：

今以各國商務論，其於中國每歲進出口貨價銀在二萬萬兩上下，約計洋商所贏之利不下三千萬，以十年計之，則三萬萬，此皆中國之利有往而無來者也，無怪近日民窮財盡，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則為中國計者，既不能禁各國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務而已。³²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提到：

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商互相表裏。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³³

在注意到商業重要性的同時，知識份子更進一步希望以商制商，時鄭觀

³¹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272。

³² 薛福成，《籌洋芻議》，《庸盦全集》（台北：華文書局局，民國60年）。

³³ 鄭觀應，《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商務一》（台北：中華雜誌社，民國54年）。

應認為「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拮克，敵國無形……習兵戰不如習商戰」³⁴，主張以發展商務來因應西方經濟侵略。此種商戰思想非特鄭氏獨見，而是當時知識份子的普遍見解，盛宣懷以「開關互市，實以商戰為上策」³⁵；譚嗣同指出「今欲閉關絕市，既終天地無此一日，不能不奮興商務，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豈一戰能了者乎」³⁶；嚴復、張謇、袁世凱、汪康年等人均有過相關言論，商戰觀念可謂當時社會思想主流之一。³⁷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許多重商觀念並非由商人自身所提出，而是知識份子審時度勢後發表之看法。可以看出重商的觀念此時才轉化到整個思想層面上，也正因為如此，商業的推展工作不再只限於商人，而是各界關注的焦點，商業的推廣也得以更為全面深入。

中國欲以商應戰，則應注意商學，培養商業人才以應大局，故興學之議起。鄭觀應提到：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需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³⁸

我國通商數十年，出口貨少，入口貨多，民間日用之物，無不來自外洋。各礦各製造廠所用礦師、工師、機械師、輪船駕駛及海關之稅務司，均聘用外人，已數十年，尚無華人可代。非但金錢外溢，權亦外操。亟應步武德日，誘掖後學，並開農工商專門學堂及駕駛學堂，務使人材日出，百藝俱興，駕駛有人，稅由自理，無庸借材異域，庶幾漏卮可塞，富強可望也。³⁹

³⁴ 鄭觀應，《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商戰上》（台北：中華雜誌社，民國54年）。

³⁵ 盛宣懷，《愚齋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52年）。

³⁶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6年），頁292。

³⁷ 「商戰」一詞最早出現在曾國藩致湖南巡撫毛鴻賓書中：

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以西洋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權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

王爾敏曾將晚清提過「商戰」言論者加以整理製表，以示此觀念在當時的普遍性。參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5年6月）。

³⁸ 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台北：中華雜誌，民國54年）。

³⁹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

陳熾以西洋「人才眾多，則皆出於商學」⁴⁰，張之洞則認為「商學系考求製貨理法，銷貨道路，綜核新式擁商律例以及中外盈絀，銀幣漲落，各國嗜好，各業衰旺情形，自應設立學堂，延師教習，方能增長智術」⁴¹，而盛宣懷更視商務為當時最急之需，而為了振興商務，定要講求商學，因為商學是培養商戰人才之所。⁴²張謇則提出：商學之傳播普及有賴於商業教育。⁴³以此，興辦商業學堂以培育商戰所需人才成為當時知識份子的共同看法。

光緒19年(1893年)，張之洞於湖北設立自強學堂，其中設有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科，可謂是近代中國商業教育的第一步，然因受限於師資，格致、商務兩科的教多流於空談，所以在光緒22年(1896年)停辦。⁴⁴光緒22年，江南儲才學堂成立，分設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但其施辦情形不得而知。⁴⁵同年，提倡商務最力的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其中即有培育商業人才之計畫。⁴⁶依盛宣懷的構想，南洋公學內應設達成館，以「取成才之士，專學英法語言文字，專課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學。期以三年，均有門徑，以通大要」。然南洋公學並沒有照預訂設立這些專科。之後，盛又擬於南洋公學之外成立附屬商業學堂，光緒27年(1901年)派南洋公學監院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赴美、英、比、法、意等七國考察商務學堂，並請駐外使臣幫忙購置有關商學商律等書籍。⁴⁷但是，當時任學堂總理的勞乃煊議緩創辦，擬將

⁴⁰ 陳熾，〈分建學堂說〉，《續富國策》。

⁴¹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49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52年)。

⁴² 〈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情形摺〉，見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76-78。

⁴³ 見劉桂林著，《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頁103。

⁴⁴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頁93。

⁴⁵ 何晚夏、史靜寰著，《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61。

⁴⁶ 在劉桂林的《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一書中認為盛宣懷在所有實業教育中講得最多的是商業學堂。見《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81。

⁴⁷ 陳先元、田磊編，《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03。

學生改派往國外留學。光緒29年(1903年)，盛再提商務學堂一事，「時局既以商務為亟，而商學尤以儲才為先。現在各省設立高等學堂，考求政藝，不患無人，獨商學專門未開風氣」，⁴⁸故建議南洋公學上院改為高等商務學堂，光緒30年(1904年)，上准其奏，然不數月南洋公學改隸商部，改成高等實業學堂。⁴⁹盛宜懷極欲創設的商業學堂，終未能竟其業。商業學堂的開辦仍待清廷的推廣，才能逐步逐地加以設置。

三、商業學堂的設置情形

(一)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

光緒29年(1903年)，清廷頒布《學務綱要》，開始大規模、全面性地推行各項新式教育，除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等普通教育外，尚有培育教師的師範教育、培養專業人才的法政學堂及實業學堂。實業學堂內含農、工、商學堂，商業學堂即是內含在實業教育之中：在「通商繁盛之區，宜設商業學堂」⁵⁰，分為高等、中等、初等三級，高等商業學堂需要普通中學畢業者才得以入學，以「使通知本國、外國之商事商情及關於商業之學術、法律，將來可經理公私商務及會計，並可充各商業學堂之教員、管理員為宗旨」⁵¹，中等商業學堂收高等小學畢業生，「以授商業所需之知識藝能，使將來能從事商業為宗旨，以各地方人民至外縣外省貿易日多為成效」⁵²，初等商業學堂收初等小學畢業生，「以教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夏東元，〈盛宜懷的教育思想與人才培養活動〉，《盛宜懷與上海交通大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04。

⁵⁰ 〈學務綱要〉，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5年)，頁212。

⁵¹ 〈奏定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篇〉，頁346。

⁵² 〈奏定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篇〉，頁353。

授商業最淺營生計為成效」⁵³。三級商業學堂均以培養商業貿易能力為其要旨，但範圍有所不同。高等商業學堂要能通曉中外商情，以助中外貿易工作，或為商業學堂教習；中商業學堂則是以培養人才發展國內商業，促進國內商業流通；初等商業學堂則以養成人民基本商業能力，使其得以於地經商營生。如三級商業學堂得以籌設完全，則小至人民生計，大至國家經濟、商業教育發展，均有人才可用，則富國裕民之目標幾可成矣。

(二)商業學堂的設立

《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後，各地商業學堂逐漸興設。關於商業學堂的設立，除了學部所做的教育統計外，其餘資料則散布在各類官報、報刊雜誌、商會檔案資料內。今將其分別整理為表二：各省商業學堂設立情形表；表三：各地商業學堂設置情形表，一併來觀察分析。

表二：清末各省商業學堂設立情形表

	光緒31年			光緒32年			光緒33年			光緒34年		
	官立	公立	私立	官立	公立	私立	官立	公立	私立	官立	公立	私立
直隸											2	
奉天				1						1		
江南				1						1		
江蘇		1	2					3	3		5	3
湖北	1			2						2		
福建										1		
總計												

資料來源：(清)學部總務司編，《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

⁵³ 《奏定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篇》，頁358。

表三：清末各地商業學堂設置情形表

	校名	地點	創辦者	時間	生數	備註
1	初等商業學堂	江蘇	江蘇川沙商會	清末		
2	銀行專科學校		通崇海泰商務總會	清末		
3	商業學校		同上	清末		
4	商業啓智學校	江西	江西商務總會	清末		
5	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	蕪湖總商會	清末	20	
6	甲種商業學校	江西	南昌總商會	清末		
7	商業日曬義務講習社	江蘇	徐浩然			
8	長蘆中學堂銀行專修科	直隸				
9	商業夜塾	江蘇	松江商會	1907		
10	營口商業學堂	奉天	日本人	1904		光緒31年爲清廷收回
11	商務半夜學堂	直隸	學董林墨青	1904		
12	私立商務叢學堂	北京		1904		
13	商務中等學堂	湖北	商紳李正源	1904		
14	商務學堂	湖北	官立	1904		
15	半夜學堂	直隸	天津商務總會	1905		設有三處
16	商務半日學堂	安徽	蕪湖商務局	1905		
17	工商學堂	天津	天津紳商	1905		
18	商務實業學堂	廣東	職商黃挺年	1905		
19	商業夜塾	北京		1905		
20	商務實業館	黑龍江	商民	1905		
21	商業半夜學堂	廣東	清平學堂校長	1905		
22	商務實業學堂	江蘇	陸春帥	1905		
23	中等商業學堂	直隸	天津商務總會	1906	120	
24	梅里商業學堂	江蘇	江蘇梅里商會	1906	40	附額20名
25	商業學堂	四川	曹漱珊等商界人士	1906		

26	簡立學堂	江蘇	鎮江商會吳蘭賓等	1906	80	
27	高等商業專科	湖南	胡元俊等人	1906		明德學堂附設
28	江南中等商業學堂	江蘇	商務局	1906		
29	商業學堂	江蘇	上海商業公會	1906		
30	典當公學	江蘇	典當各局	1906		
31	商業學堂	廣西	梧州	1906		
32	商業學堂	四川	曾楊二君	1906		
33	公立商業補習夜館	江蘇	劉啓勳等人	1906		
34	天津商務半夜學堂	直隸		1906	60	分設三所，(和15似否相同)
35	補習社	江蘇	上海洋布商	1906		
36	初等商業學堂		直隸高陽商會	1907	41	1910年改中等
37	初等商業學堂	北京	津紳張月丹	1907		後設江南高等商業學堂，和其合併為高中兩等商業學堂
38	商業半日學堂	江蘇	錫金總理周廷弼等設	1907		
39	商業學堂	浙江	甯波典當商董	1907	100	
40	第一初等商業學堂	直隸	天津商務總會	1907	40	
41	華英商務學堂	直隸	職商陸光茂	1907		
42	中等商業學堂	福建	官辦	1907		
43	商業初等小學	江蘇	鎮海商務分會	1907		
44	商業中學堂	湖北		1907		
45	商業半日學堂	北京	沈毅青	1908		
46	商業夜學	北京	沈毅青	1908		
47	商業速成班	直隸	旅津德商	1908		
48	商業中學堂	山東		1908		
49	商務小學堂	江西	撫州教育分會	1908		

50	速成商業學堂	浙江	郡紳王君	1908		
51	中等商業學堂	廣東		1908		
52	江陵縣初等商業學堂	湖北		1908		
53	漢口商業中學校	湖北		1909		
54	常德油業私立初等商業學堂	湖南	湖南商務總會	1910		
55	武昌初等商業小學堂	湖北		1910		
56	浙江中等商業學堂	浙江		1911		

資料來源：本表是由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張垣忠，《上海總商會研究》、《天津商會檔案匯編》、《學部官報》、《商務官報》、《遼寧教育史》、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近代化》等資料加以整理而成。

從上列兩表可以看出清末商業學堂設立的幾項特點：

首先，商業學堂主要集中在直隸、江蘇、湖北等地，直隸為全國行政中心，也是新式教育推行的模範區，各式學堂廣立，加以省內天津為北方重要商埠，商業興盛，故有設立商業學堂的的必要；江蘇上海及湖北漢口則分別為中國南方商埠及長江水陸要衝，商人集中，商業貿易活絡，對商業人才有相當需求，所以也有商業學堂的設置。江蘇地區且有多處學堂為私人所設，更顯示出此地財力充足，育才興商風氣之盛可為全國之首。

再者，如將表二和表三加以對照，可以發現官方統計資料遠少於各項地方資料所統計出的學堂數，會有此種情形的發生，除了統計上的不完整外，許多商業學堂以半日或夜間補習的方式進行，而此種學堂未能列入官方的統計資料或是資料無法清楚呈現實際設置情形，所以有此種落差。⁵⁴而當時半日夜間學堂的設置是有實際考量因素的，如松江商會考量當地情形，認為「商家之弟之未習業者，郡中不乏學堂肄業，所最急者，莫如已習業之學生，文理未通，智識卑陋，日從事於店務，勢難

⁵⁴ 清學部的教育統計資料有其制式格式，若非正式學制內的學堂或科別很難納入統計資料內，如奉天營口中等學堂分為本科、預科，本科列於中等，預科列於補習；錦州縣商業學堂，原為簡易科，因表中無此項目，故改列入初等。見(清)學部總務司編，《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頁140-141。